

在桥梁上俯瞰深渊

——致一位法国诗人

赵丽宏

亲爱的于格斯·拉布吕斯先生:您好!

您几次来信,我都收到了,因语言的障碍,必须经过翻译我才能阅读,所以没有及时回复,还请谅解。

读您的信,我产生强烈的共鸣。确实如您所说,我们是站在同一座桥梁上(这是一座可以互相沟通,可以通达心灵两岸的桥梁)俯瞰深渊,俯瞰这个变幻无穷、让人难以看清的世界,俯瞰这个不断产生痛苦和困惑的世界。诗人可以从中获取的,也许是常人无法获得的感悟,是可以转变成文字的灵感,就像在幽暗的夜空中发现星光,在深邃沉静的水潭中发现晶莹奔涌的潜流。我们无法改变世界,无法阻止时代的脚步,无法平息人间的喧嚣,但这不影响我们的思考,也不该压制我们的自由表达。即便是沉默,也不是心灵的囚禁,而是因思索而沉静,因积蓄而暂时噤声。一旦发声,我们一定都会有独一无二的表达。尽管我们还没有机会见面,但读您的诗,读您的信,我已经感知您的非同寻常的风格。您的哲学家的气质,您的语言和诗句中散发出来的深邃而神秘的气息,都让人产生共鸣,感觉我们也许可以殊途同归,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抵达我们共同向往的境界。

关于痛苦,我同意您的见解。我们面临的苦痛,绝不仅仅是肉身的疼痛,而是因人类面临的灾难和困境而产生的焦虑,是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而产生的迷惘。诗人,未必能给这个世界提供答案,以为自己能为人类指明方向,提供终极的真

理,那是愚昧的想法。我们可以提供给世界的,只是一己之见,只是一孔之见,但这些发自灵魂的意见,会在这个世界上引起共鸣,引发回声。正像我读你的诗时产生共鸣,这是多么美好而有意义的事情。

40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痛苦是基石》,那时还很年轻,当时产生的念头,现在仍然不觉得过时。我把这首诗抄在这里供您一笑:

欢乐是外壳
痛苦才是本质

欢乐是水汽云烟
痛苦才是江海洪波

在痛苦中寻求欢乐
像在收割后的田野里
拾取遗谷

在痛苦中寻求欢乐
像在积雪覆盖的峡谷中
采摘花朵

学一学打夯人吧
把痛苦当做沉重的基石

夯,夯,把痛苦夯入心底
深深地,深深地

是的,痛苦是基石
有它,才能建筑欢乐的楼閣

你在信中谈到了西方哲学先哲的智慧,这也使我想到了中国的那些伟大的

哲学先哲,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韩非子……两千多年前,他们就用诗的方式表达了对天地万物的看法,几乎穷尽了人类的哲学命题,现在读他们的文字,依然让人心驰神往。两千多年前,地球两边的人类没有交往的渠道,神奇的是,东西方的哲人用不同方式表达的哲思,有着高度契合的内核。你所说的那个桥梁,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老子和柏拉图都曾经站在这无形的桥梁上俯瞰深渊,用不同的声音发出感叹,这和我们今天面临的情景,也有相像之处吧。从此岸到彼岸,看似几步之遥,但路途遥遥无尽。古往今来的哲人和诗人一直在跋涉追寻的过程中,也许永无终极。两千年的世沧桑,世界似乎发生巨变,高科技早已颠覆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在某些方面,在人的精神领域,其实只有微小的变化。莲花依然是莲花,玫瑰依然是玫瑰,它们的姿态和清芬,两千年来一如既往。

2020年我写了长诗《在天堂门口》,是我对诗歌和哲学的思考,也可以视为在那座桥梁上俯瞰深渊时的感慨吧。这首诗已有了英文译本,我也随信发给您,请您指教。

我们虽然还未有机会相见,但感觉彼此已有深的了解。感谢诗歌,感谢哲学,也感谢冥冥之中的美妙机缘。相信终会有相聚的一天。我们的对话录和诗歌能在法国出版如此独特的文学读本,一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

2022年8月9日于上海

(赵丽宏和法国诗人于格斯的通信对话,以及两位诗人的长诗《古莲和哥哥》《怪兽》等作品,将在法国以中、法、英三种语言合集出版)

俞粟庐与吴梅(四)

唐葆祥

记只有我来写。”这也是俞振飞生前告诉笔者的。

吴梅的《俞宗海家传》兹录于下:

君讳宗海,字粟庐,松江娄县人。曾祖启元,祖后沐,父承恩,就江南京阴营守备职。洪杨乱作,转战有功,阵亡六合。事具六合县志中。君因袭云骑尉世职,隶松江提标营。时提督李朝斌雅器君,亲为训迪,而幕中上客魏彦者,亦重君才,授以书法。君之工书,由是始也。君又长弓矢。同治中曾文正公莅松江阅兵,试马射。君三试皆中。文正大喜,以朱笔作三圈,记君名上。又呼君与语,奖勉备至。光绪中署金山县守备,甫莅事,游击某索君贿甚急。君不知营务积习,即驰白督宾魏,魏以告。督立召某游击面斥之。君以同官龃龉,知不可与处,亦谢职,改太湖水师营处办事。由是而移家寓吴矣。初,君居标营时,尝从盛泽沈景修游,通金石学。又与吴江陆恢同学北碑。陆兼画,君则一意于书,而名亦伯仲也。娄人韩华卿者,佚其名,善歌,得长州叶堂家法。君亦从之学讴。每进一曲,必令谱调数百遍,纯熟而后止。夕则操笛背奏,所习者一字未安,苛责不少贷。君下气怡声,不辞劳瘁,因尽得其秘。既居吴,吴中人士求书者无虚日。君从容挥翰,皆如其意而去。而一时期

曲家春秋社集必邀君,君亦必至。至则必歌,气纳于丹穴,声翔于云表。当其举首展喉,如太空晴丝,随微风而上下。及察其出字吐腔,则字必分开合,腔必分阴阳,而又浑灏流转,运之以自然。盖自瞿起元、钮匪石后,传叶氏正宗者,唯君一人而已。吴县张公履谦,负乡里重望。闻君名,招至其家。君感其礼遇,为之考金石,搜文史,教授子弟,历四十年如一日。履谦既歿,其子元毅,孙钟来、钟湘等皆礼貌弗衰。迨君即世,钟来复经纪其丧。则君之持躬接物,举可知焉!晚年为上海李钟珪校定平泉书屋所藏金石书画,一时名手,皆服其鉴别之精。性和易,与人交,不分畛域。苟意所不可,虽百乘之尊,辄掉首弗顾。又好导引术,端坐调息,寂然无虑。故年至八十,而神明强固如壮岁也。君生于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卒于民国十九年四月,年八十八又四。娶王氏,继顾氏、金氏。子一远威,女四,孙一。

赞曰:明嘉隆间有陈铎者,以将家子官辽东指挥使,工南词,有秋碧斋乐府,世号秋碧先生。以校君事,何其相类也。顾君又知医,兼通星名学,则秋碧或不逮欤!余尝叩君作书、哦曲之法。君曰:“气盛则慧通,识多则用广。”呜呼,是艺而进乎道矣!

(待续)



灯下偶拾

收到陆品贵同志《山脚下的那些事》,展卷拜读,勾起我回忆。

认识陆品贵同志,应该在1967年2月。其时,我在驻扎余山的上海警备区6399部队任职,他在余山广播站工作,任站长。

清楚地记得,这年这月的22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

随后我们部队遵照上海警备区首长的批示,立即组织干部和战士到余山公社帮助春耕工作。那时余山公社好像有22个生产大队和余山植物园(原属上海市农业局),每个大队有我们1名连干和2名战士驻队,另外我们还派出5名连营干部进驻余山公社机关,和余山公社的干部群众一起掀起全公社春耕

为不该忘记的那些事

——《山脚下的那些事》读后感

许金湘

生产高潮。由于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坚决,派驻部队干部战士及时且进展快和效果好,圆满完成帮助余山公社春耕生产的任务,当年3月底在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中心)召开的上海市春耕工作大会上,我们部队作为先进单位在大会上介绍了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工作的经验。

而余山广播站,作为余山公社当时重要的宣传阵地,在宣传毛主席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和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报道余山公社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等系列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调动了广大社员和各级干部春耕生产的积极性,为完成春耕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作用。余山广播站也宣传了我们部队在帮助余山公社春耕生产中的好人好事。当时我们部队和余山公社部分文娱骨干,还组成了6399部队余山军民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广播站每天播送宣传队的节目,社员们说:军民团结如一人,春耕生产必定是一场大胜仗!

这期间,为确保余山广播站不受任何干扰,安全顺利地工作,我们部队指定了一名同志专门对接广播站,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及个人,不经部队同志的批准不能动用广播站的任何设备作任何用途。也就在那时,我和陆品贵站长接触较多。陆品贵同志政治立场鲜明,工作热情高,工作能力强,广播站工作安排有秩序,忙而不乱。印象深刻的是,他经常深入各生产大队,检查广播线路和广播设备,一旦发现问题,立马解决,从不拖延。时值“文革”时期,为应对时局常有的突发情况,他还经常吃住在广播站,他说无论如何,都要在第一时间将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军民鱼水情宣传给广大社员。

除了工作,陆品贵同志热爱写作是他那时留给我的另一个印象。后来的很多年里,偶尔我在《余山报》上看到他的

美文,再后来,他的文章就常见诸《松江报》了。几十年了,我没想到陆品贵同志笔耕不辍,皓首之年付梓成书。心下欣喜,为他叫好。

《山脚下的那些事》全书共60篇文章,三大篇章,从《广播往事》到《旧事重提》再到《传说新语》,真实地记录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和余山山水水的情缘,展现余山地区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余山地区人民的勤劳善良,以及为建设这块土地而洒下的汗水、走过的足迹,不啻人生印记,更是余山史料的文化记载。

品读陆品贵同志的文章,不论《初创时期的余山广播站》《田头高音喇叭》,也不论《老底子的凤凰山小镇》《崎岖的余山小路》,更不论《两条青蛇护银杏》《余山兰花笄》,无不文从字顺,朴实无华;无不笔下有神,字里有光焰,寓意多深刻。

掩卷思忖:《山脚下的那些事》是乡情乡音和乡愁?抑或是一种回望,为不该忘记的那些事。

生活茶座

费水弟书

张乐平与“三毛”的不解之缘

朱少伟

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离开我们已整整30年了,但他笔下的“三毛”形象依然充满生机。

1935年7月28日,张乐平首创的“三毛”亮相于上海《晨报》星期日增刊《图画晨报》,那是个滑稽幽默的弄堂小顽童。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张乐平发起成立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并带领漫画宣传队辗转各地,创作和展示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漫画作品;抗战胜利后,他回到申城,又通过作品深刻揭露社会黑暗,并着手创作《三毛从军记》系列漫画,由《申报》连载,反映在战火中“三毛”曲折的投军从戎之路。1947年6月15日,张乐平受贫困儿童悲惨遭遇触动而创作的《三毛流浪记》系列漫画,开始在上海《大公报》连载,他曾表示:“我每天离开自己的屋子走到每一条大街上,我都可以看见我所要创作的人物。他们永远是瘦骨如柴,衣不蔽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以避风雨的藏身之处”“我愤怒,我咒诅,我发誓让我的画笔永远不停地为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朋友们控诉,为这些无辜的苦难的孩子们服务”“我把我对他们的同情、友爱,通过我的画笔付与‘三毛’。这部‘中国式的《苦儿流浪记》’很快家喻户晓,以至常有读者写信、汇款、寄衣物到编辑部,希望通过报馆去接济‘三毛’。为此,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指出:“《三毛流浪记》不仅揭露了人间的冷酷、残忍、丑恶、诈欺与不平,更可宝贵的,是它还在刺激着每个善良人类的同情心,尤其是在培养着千千万万孩子的天真同情心!”

当年,对于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系列漫画,宋庆龄也予以关注,她还专门托人帮自己购买“三毛”的漫画赠给外国小朋友。宋庆龄鉴于“圆鼻光头三根毛,贫困凌辱一人扛”的“三毛”实际已成贫困儿童的“代言人”,决定运用其影响力,由所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沪创办“三毛乐园”,以救助更多苦难的流浪儿。她曾对外国友人说:“我们正在举办‘三毛乐园会’。三毛是一个可爱的、中国漫画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经历了中国穷苦孩子所要经历的一切苦难。他现已成了一个‘小先生’,而且我们正在用他进行一次筹款活动。”

1949年1月下旬,宋庆龄委托冯亦代及其夫人郑安娜出面联系,诚邀张乐平一起筹办“三毛生活展览会”,为“三毛乐园会”的救助工作开展宣传、筹措资金。张乐平不顾自己正在病中,马上表示愿为“三毛生活展览会”竭尽全力,仅隔数日便拿出了方案。宋庆龄看后很满意,及时答复在浙江嘉兴疗养的张乐平。不久,张乐平来沪,在一个月内心精心赶画了30幅“三毛”水彩画,还特意将“三毛乐园会”设计一枚别致的纪念徽章,又整理出自己的一批“三毛”原作。

1949年3月下旬,“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一幢弄堂房子里举行预展;接着,又在外滩汇丰银行(旧址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礼堂向外国友人展出。宋庆龄拨冗到场与参观者见面,还特意把张乐平请到身边与之亲切交谈,一同接受记者采访。张乐平曾回忆:“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近60,看上去不过40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

口道地的上海话。她很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如何,怎么画起‘三毛’来的,等等,完全是亲切的家常式的谈话。外国朋友同我谈话,宋庆龄亲自翻译。开始我还有点拘束,看到她这样和蔼可亲,就很快自然起来。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

1949年4月4日,“三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大新公司(旧址现为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4楼开幕。当天,张乐平在《大公报》发表《我怎样画三毛的——为“三毛义展”写》,其中说:“孙夫人主办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友还举办‘三毛义展’。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成熟,特别是30张彩色义卖作品,都是在带病中赶画的,但是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三毛作者的我,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么?”宋庆龄在百忙中抽空,莅临展览会。不少上海民营广播电台都推出特别节目,用国语、沪语和粤语播出展览会实况;著名话剧演员尹青同情“三毛”,义务担任现场播音员,厅里不时回响着她那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救救‘三毛’!”展览会展出《三毛从军记》和《三毛流浪记》原作300余幅,深深吸引人们,那些用于义卖的“三毛”水彩画,以及张乐平设计的“三毛乐园会”纪念徽章和作者签名的《三毛流浪记》单行本,均被踊跃认购。展览会为期6天,展厅里观众如潮,热闹非凡,共有40余人捐款加入“三毛乐园会”。展览会共筹得3200多银元,可维持千余名流浪儿一个月的生活;又收到大量书籍、文具、衣服、食品、药物,可满足许多流浪儿生活、学习之需。展览会圆满结束后,宋庆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张乐平表示感谢和勉励,并随赠几罐克宁奶粉和两块调料。

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先前计划摄制根据张乐平系列漫画改编的《三毛流浪记》,因故近年未能正式启动;宋庆龄亲自筹划“三毛生活展览会”,“三毛之父”也积极投入,无疑对该片的拍摄具有促进作用。1949年4月1日,《三毛流浪记》在外滩开了第一个镜头。由阳翰笙编剧的《三毛流浪记》,堪称是一部非凡的电影,聚集了数十位上海影星,他们均心甘情愿围绕“三毛”做配角。《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上海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曾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的义演义卖慈善活动。

申城解放的第二天,张乐平与一批进步美术家共同签署并发表《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要“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张妮妮的《父亲张乐平在1949》说:“上海市政府举行了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文艺等各界代表162人出席,我父亲也光荣地名列其中……父亲的肺结核在那年也痊愈了!这一方面得益于宋庆龄先生送的进口药‘雷米封’,而他愉快的心情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宋庆龄的亲切关怀,张乐平治愈疾病。他以前所未有的创作热情,让“三毛”进入新的生活,在阳光雨露沐浴下健康成长,焕发新的活力。这样的艺术升华,使得“三毛”永远不朽。

张乐平与“三毛”的不解之缘,成为一个在岁月流逝中永不褪色的佳话。



松江闲话

定被头

盛济民

缝被子,松江话叫“定被头”。例如:

(1)定被头看似粗针大线,其实用针线拿被面子、被夹里搭被絮服帖帖固定拉一道,既没一眼本事还弄勿连穿。

(2)当年我作为知青到农村插队,村里大娘常庄来帮我定被头,定被头。

(3)松江婚俗,女家为新娘子准备嫁妆,通常由亲娘亲手定被头(俗称“缝喜被”),其次才是阿姨、姑娘和姨妈等亲人。

(4)现在新娘嫁妆,可以说无所勿包:大到汽车洋房,小到一包定被头引线(引线:缝衣针)。

“定被头”的“定”,《简明吴方言词典》的解释是:“用针线固定面儿、里子和棉絮。如:定衣裳、定被头”。松江话里,“定被头”还有其他的叫法和写法,譬如“订被头”“绗被头”“缝被头”等等,这些词语中的“订”“绗”“缝”均表示“缝”的意思。